

中国古典文学“中和优化”翻译策略研究

邹 灿

(成都理工大学 外国语学院,成都 610059)

摘 要:进入 21 世纪以来,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剧,促使世界各国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不断开展了广泛的交流与合作。全球跨文化交流的日益深入也加速了中国古典文学的对外传播,对翻译的要求也相应提高。在对具有丰富历史底蕴和文化负载的中国古典文学进行英译时,单纯使用直译或意译,归化或异化的翻译策略都很难实现既保留源语的文化特点又符合目的语表达习惯的翻译目标。为此,文章创新性地提出了“中和优化”的翻译策略,即在跨文化视阈下,翻译中国古典文学时,译者应针对语言和文化差异,综合考虑源语和译语的语言和文化特征、原文作者的写作意图、情感内涵和目标受众对源语及其所内含文化的理解水平、接受程度等因素,选择恰当的翻译策略或策略组合对译语进行相对异化。在保持译文适度异化的基础之上,在原作和译作之间找到一个融合点,通过译者的艺术再创造加以优化,突破源语语言形式的束缚,在形与神、信与美的对立中寻求和谐优化,使源语与目的语、作者与读者相互和谐顺应,既使译文准确、顺畅、生动,符合古典文学的表达方式,又能让读者领会源语所蕴含的语言之美和文化内涵,通过读者和作者之间的对话,达到传播中国古典文化之目的。

关键词:跨文化视阈;中国古典文学;中和优化;翻译策略;归化;异化

中图分类号: I046;H31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8580(2017)03-0085-16

一、问题提出

所谓“跨文化”是指在全球化中,社会流动性增加和种族混杂造成的一种社会现象,这种现象的本质是改变传统和现存的文化,是创造新文化;是跨越了不同国家与民族界线的文化,是不同民族、国家及群体之间的文化差异,是通过越过体系以经历文化归属感的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关系。从学理上讲,所谓跨文化是指在交往中参与者不只是依赖自己的代码、习惯、观念和行为方式,而是同时也经历和了解对方的代码、习惯、观念和行为方式的所有关系^①。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3BZW106);四川省翻译协会重点项目(201501)

作者简介:邹灿,副教授,硕士生导师(E-mail:444538927@qq.com)

《辞海》将翻译定义为“把一种语言文字的意义用另一种语言文字表达出来^[2]”。笔者认为,此定义中的“意义”不能仅指该语言文字的意义,还应包含其所体现的文化意义。无独有偶,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王克非将翻译理解为“将一种语言文字所蕴涵的意思用另一种语言文字表达出来的文化活动”^[3]。即翻译最基本的作用在于促进不同文化间的沟通和交流。季羨林先生在为《中国翻译词典》所注的序中明确指出:“中华文化这一条长河,有水满的时候,也有水少的时候,但却从未枯竭。原因就是有新水注入。注入的次数大大小小是颇多的。最大的有两次,一次是从印度来的水;一次是从西方来的水。而这两次的大注入依靠的都是翻译。中华文化之所以能长葆青春,万应灵药就是翻译。翻译之为用大矣哉”。“只要语言文字不同,不管是在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华民族包括很多民族)内,还是在众多的国家或民族间,翻译都是必要的。否则思想就无法沟通,文化就难以交流,人类社会就难以前进”^[4]。很多从事翻译研究的中外学者都提出,翻译不仅是语言形式的转换,更是相应语言所承载的文化信息转换,所有翻译活动都是跨文化的活动(cross-cultural event),都具有跨文化性质。从本质上看,翻译是跨文化的信息传播,如文学翻译是美学信息的跨文化传播,科技翻译是科技信息的跨文化传播,应用文体的翻译是实用信息的跨文化传播等等^[5]。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进一步加大,作为有着五千年优秀历史的文化大国,中国的国际地位逐渐提高,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军事、体育等各方面都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将人类共享的优秀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加以传播则成为扩大中国影响,让世界了解中国的重要举措。

作为中国古典文学作品重要表现形式的诗词有些什么主要特征,在跨文化视阈下如何理解中国古典文学文本的翻译原则、标准,采用什么样的翻译策略进行有效的语言形式转换和文化信息传播等问题一直是进行富含文化内涵的中国古典文学翻译活动时面临的主要难题。

因此,本文拟在跨文化视阈下,以中国古典文字部分翻译作品为例,通过分析其在词汇、句子及篇章等层面的翻译,探索出更加适合古典文学作品的翻译策略。

二、中国古典文学的主要特点

中国古典文学泛指自先秦到清末的所有中国文学作品,发展历史源远流长,受中国的历史、文化的影响巨大,表现出特有的民族性、传承性和时代性的特征。它以汉民族的文学为主,兼容了一些少数民族的历史与文学,充分体现了古典文学的丰厚历史和博大精深,显示了以中国文字为载体的中国古典文学极其丰富的内涵和巨大的张力。

按文学史的习惯,中国古典文学可以大致划分为先秦文学、秦汉文学、魏晋南北朝文学、隋唐五代文学、宋元文学和明清文学。中国古典文学包含诗、词、曲、赋、散文、小说等丰富的表现形式。在各种文体中呈现出多姿多彩的表现手法,是中国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宝库中的瑰宝。中国传统文化为中国古典文学提供了丰厚的文化土壤,中国古典文学又大大丰富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国古典文学在悠远的历史岁月中积淀了中华民族独有的语言特色、意识形态、文化体系和思维方式,从思想和内容上具有政治性、补史性、地域性、哲理性、教育性、情

感性、道德性、宗教性、美学性等特点。基于跨文化的翻译视角,本文拟就以下几个特点加以重点讨论。

(一)补史性

诗人的作品大多会再现自己亲身履历的重要事件或某些情感历程,人们往往把文学当作其咏物、抒怀、言志的工具和手段。被称为“诗仙”的唐朝大诗人李白一生放荡不羁,从他的大多数作品里可以读出他年少时的心高气傲,中年时的自信进取、恃才傲物以及后期政治失意的惆怅和苦闷。同样,“诗圣”杜甫在其作品中清楚再现了他所处时代的战乱和人民的苦难,“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因此他的诗也被称为“诗史”。在翻译具有此类特征的文学作品时,译者要根据实际情况确定是否有必要补译作品所反映的历史时期或作者的写作背景。

(二)教育性

中国的文字的教化传统要求文学作品具有歌颂光明正义,批评黑暗腐朽,扬善惩恶等作用,作品在表达鲜明的思想倾向的同时,还应该蕴含符合中国传统美德的教育功能。文学家和文学批评家为了表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和人文关怀,一直致力于利用文学作品实施人文教育,劝导生活方式,劝诫不良人生,倡导伦理道德,强化爱国意识。比如唐代诗人王维于重阳节创作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就强烈地表达了诗人对家乡对兄弟的怀念。又如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的项羽;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于谦;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的林则徐以及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谭嗣同等足以带给后人极强的认同感和诸多感悟。

(三)情感性

中国古典文学具有极强的情感特征,文人们喜欢从性情或性灵入手,在作品中表现其丰富的情感内容,竭力追求文学的美感和抒情性。尤其是到了唐代,文学作品往往于浑厚坚实中寓有一气呵成的精神气脉和情感力量。曹操《短歌行》中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便是诗人哀民生之须臾的感慨。而杜甫的《登高》却是字字哀愁,句句血泪,将其后半生遭遇的国衰,友亡等家愁国恨凝聚成万里悲秋,铸成悲壮苍凉的意境: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

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四)美学性

中国古典文学的诸多文体,诗、词、曲、赋、散文、戏曲、小说等都各具节奏、旋律、意境、趣味等而表现出独特的美感,而这种美感通过简练独到的语言表述出来,将读者带入文中的意境之中,仿佛置身于彼时彼刻,成为事件的参与者而不是旁观者。如中国古典四大名著的《红楼梦》以古朴典雅、明快灵动的语言生动描绘了一幅大观园由盛及衰的图画;语言朴实、简洁的《水浒传》刻画出栩栩如生的兄弟情义和对统治者的反叛精神;画面宏大、人物众多的《三国演义》将

读者带回遥远的波澜壮阔、斗智斗勇的历史战场;而幽默诙谐、想象奇特的《西游记》则展示出一个光怪陆离、色彩斑斓的神话世界,彰显坚持不懈、持之以恒的执着精神。

三、中国古典文学的翻译原则

对于翻译原则,国内外翻译学者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并且成果颇丰。20世纪末,Venuti率先提出了翻译的归化(domesticating translation)和异化(foreignizing translation)^[6],并由此引发了旷日持久且还可能继续下去的关于翻译归化(domestication)与异化(foreignization)的大讨论。在此讨论过程中,Vermeer和Nord又提出了翻译的“目的论”(Skopos Theory),主张根据翻译的三个准则(目的法则,语内连贯法则和语际连贯法则),从翻译的具体目的出发确定采用的翻译策略,即评判翻译的标准不再是“对等”,而是译本实现预期目标的充分性^[7]。国内学界的众多学者也对此提出了不少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的见解。一百多年前严复就提出了“信、达、雅”的翻译标准并在中国翻译界产生了巨大影响。基于其和谐之美文艺思想的特质,傅雷以“形似与神似”的和谐统一作为其翻译观的核心思想,“要求传神达意,铢两悉称,自非死抓字典,按照原文句法拼凑堆砌所能济事”^[8]。针对别人对“神似”说翻译论的误解,傅雷解释道:“我并不是说原文的句法绝对可以不管,在最大限度内我们是要保持原文句法的,……而风格的传达,除了句法以外,就没有别的方法可以传达”^[9]。翻译大家许渊冲先生在《文学翻译与中国文化梦》一文中明确指出:“文学翻译的第一标准是求真,第二求善,第三求美。求真是低标准,求善是中标准,求美是高标准。西方译论要求对等,只停留在求真阶段,还在必然王国进行斗争;中国译论早已超过求真,已经进入自由王国求善求美了”^[10]。这些讨论与各种翻译理论的提出大大地促进了在跨文化交际背景下的翻译研究。

作为中华文明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古典文学,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产生了一代又一代杰出的作家和无以计数的优秀作品,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文学现象、文学潮流和文学理论。中国古典文学在思想内容和语言描写等方面具有极其鲜明的政治、补史、地域、哲理、教育、情感、道德、宗教、志异和美感等特征,为其翻译增加了很大的难度。由于汉语的思维方式和语言表达习惯与英语存在着较大差异,因此在中国古典文学英译时,既需要照顾中国人的思维特征,又要考虑到西方人的语言表达习惯,尽量在两者之间取得平衡,即尽量做到传神达意,或者说是传神地达意。翻译标准是意会和领悟的,并非像尺子那样准确测量。但在中国古典文学英译时,还是应该把握以下几个原则。

(一)准确性

在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翻译实践中,必须将准确性作为古典文学翻译的首要原则。对印欧语而言,汉语本身就具有较强的抗译性。而古典文学中的语言文字简洁干练却又意境深远,和现代汉语在意思和用法等方面有着较大的差异,要提高目标受众的信息接收准确度,首先就要保证信息传递的准确度,否则读者会不知所云。

(二)艺术性

语言艺术属于艺术美范畴,与普通的源语文本不同,中国古典文学中诸如诗、词、歌、赋等丰富多彩的艺术表现形式俯拾皆是。涉及语言艺术的翻译活动,是一个语言审美的过程。译者是原文的审美主体,读者是译文的审美主体。译者需努力保留源语的艺术风格,建构与作者相近的审美意象^[11]。茅盾曾将文学翻译理解为:“文学的翻译是用另一种语言,把原作的艺术意境传达出来,使读者在读译文的时候能像读原作一样得到启发、感动和美的感受”^[12]。罗新璋也指出:“文学翻译是用另一种语言创造艺术价值和相等的美学价值”^[13]。尽量保持原文的写作形式,以诗译诗,以词译词,使受众在获取文本信息的同时,能体会到不同源语展示的其特有的艺术性,从而避免单一的信息传递。

(三)文化性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在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表现尤其突出。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翻译的译者不难发现,源文所承载的丰富文化内涵会不可避免地影响甚至阻碍信息的传播和交流,产生翻译中的文化隔阂。因此,译者必须通过文化认同、文化阐释、文化承载和文化改写来完成中国古典文学的异域再现,以达到通过翻译传播中国文化的目的。

四、翻译的文化转向

翻译活动具有语言交际、文化传播、跨学科、跨文化等多重属性。Nord 提出,翻译事实上是一种多层面的跨文化交际活动。从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欧洲特别是英国的一些学者相继发表了一些研究阶段系统和重新审视文化内涵的文章和专著,这标志着文化学的兴起。到了 20 世纪 70 年代,以色列学者佐哈尔为代表的学者提出了多元系统论,该学派突破了语言学派专注于不同语言之间的对比、转换,而是把翻译和社会、历史、文化联系起来,认为“文学作品是社会、文化、文学和历史整体框架的组成部分”,“单个文本的孤立研究被置于文化和文学多系统中”^[14]。基于翻译活动的跨学科跨文化等特点和全球化趋势的进一步发展,上世纪末以苏珊·巴斯奈特(Bassnett)为代表的翻译文化学派提出了翻译的“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将翻译和翻译研究的视角从纯语言形式层面拓展到了研究文化层面各因素对翻译活动的影响。她认为翻译绝不是一个纯语言行为,它深深根植于语言所处的文化语境之中^[15]。

翻译是一种文化现象,它不是静态地、被动地传递原文的语言形式,而是积极地、主动地,在不同文化之间进行交流和传递,是依据不同的文化语境对语言符号进行再解释、再创造的一个无止境的过程。翻译的“文化转向”的提出将翻译的研究重点从单纯的语言转向了文化,从源语文本转向了翻译文本,从作者转向了译者,同时将翻译实践从“语言传递”(linguistic transfer)转向到了“文化传递”(cultural transfer),将翻译看成是交际行为而非单一的文字替换或转码过程,使译者不再局限于源语的文本结构,注重文本背后隐藏的文化因素及其与外部世界的紧密联系,打破了传统翻译仅局限于语言层面的桎梏,为跨文化的翻译研究开拓了一个全新的视野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借鉴,从而较全面而丰富地推动了翻译学的发展。在翻译

实践中,译者需要充分发挥主体性和创造性,将语言研究和文化研究结合起来,在深入探索语言使用与语言转换机制各层面的因素基础上,使翻译的文化转向获得新生^[6]。

五、“中和优化”的翻译策略

笔者认为,中国文化在中国古典作品中的重要地位及对跨文化翻译的意义和影响不容忽视。在对中国古典文学进行翻译的过程中,译者应在宏观上将翻译看成是不同文化间的转换,而且这个转换过程除需包括最表象的语言文本本身的形式和意义,还应包括源文本所反映的特等历史时期的社会文化因素,如,历史、地理、经济、文化习俗、社会规约等,这就跨越了传统翻译中仅仅以信息和语义为主体的翻译范畴。因此,翻译活动在语言形式转换的基础上,应站在更加广阔的跨文化的视阈来研究语言和翻译及文化和翻译的关系,语言和以语言为载体的翻译活动既要受到各种文化因素的影响,又要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不同文化的内涵及其差异,促进文化的发展和传播。

基于实际翻译过程中对跨文化视阈下的翻译原则、标准、策略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中国古典文学这一特殊的源文本,笔者尝试性地提出“中和优化(balanced optimization)”的翻译策略,以期尽量使中国古典文学翻译在语言形式和文化信息传递等方面达到与原文的近似和对等,达到让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世界获取人类共同的文化财富的目的。

(一)“中和优化”翻译策略提出的背景

翻译本质上是跨文化的交际活动,不仅是不同语言的转换过程,更是不同社会文化的转换过程。那么在翻译活动中,如何跨越文化的障碍,在目的语中忠实再现源语文化内涵,同时源语文化因素又能够顺利地被读者理解领悟,并使源语文化得以交流传播,就成了翻译界长久以来的难题。译者总会面临着翻译是倾向于源语文化还是倾向于目的语文化的抉择,在这个问题上,到目前为止翻译界一直存在两种对立的观点及翻译策略,即归化和异化翻译。在1995年美国翻译理论家 Venuti 在《译者的隐身》中提出这两个概念之前,传统的翻译策略习惯用直译和意译来表达。归化和异化是在直译和意译的概念上发展延伸起来的,但在翻译的侧重点上又异于直译和意译。直译和意译主要关注如何在语言层面上处理形式和意义,而归化和异化则突破了语言因素的局限性,将视野扩展到了语言、文化和美学等要素上面^[7]。随着全球跨文化交流的日益深入,单纯的直译、意译和归化、异化的讨论及运用已逐渐失去现实意义,因为任何一种翻译策略的单一使用都很难达到既保留源语文化特点又符合目的语表达习惯的目标。

1. 归化

归化以符合目的语的语言特征、美学标准、道德价值观及社会文化特征选择翻译文本,源语的语言形式和文化因素的处理以目的语为归宿,以目标受众习惯的表达方式传达原文。在翻译中采用透明流畅的风格,最大限度地淡化原文的陌生感,时对源语文本内容进行有目的的删减或改写,从而使译语在内容形式上归化于目的语,增加对原文的理解度,增强译文的可

读性和欣赏下。宁可牺牲源语的忠实性,也要保持目的语的连贯性。作为归化翻译的代表人物,Nida 一直主张译者应以最自然的表达,使读者在其目的语文化中找到最贴切的理解。在中西方近一百年的翻译实践中,归化策略都扮演着支配角色。

2. 异化

异化翻译强调翻译过程中源语的语言形式及其承载的文化传统的转换应以源语为归宿,以作者为中心,突出源语的异域文化特点和作者写作思想及风格,翻译的目的不在于求同,而在于存异。Venuti 认为西方的归化翻译理论是建立在以民族中心主义和帝国主义文化价值观基础上,为了抵御本族中心主义和文化自恋对异域文化的削弱作用,就必须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文化本身是一个开放体系,具有不可估量的吸纳和包容能力,同时,文化又具有很强的渗透力。翻译的主要功能就是向读者介绍和传播异国文化信息,读者应能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和丰富想象力来接受、理解不同的文化特点,并借鉴学习进而丰富目的语语言表达形式与文化内涵。

归化还是异化归根到底还是翻译策略的问题,而恰当的翻译策略就是要调和归化和异化的矛盾,兼具二者之长,通过选择使译文在接近读者和接近作者之间找一个“融合点”。这个“融合点”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根据源文本和译本的实际情况,时而向作者倾斜,时而向读者倾斜。但无论向哪方倾斜,都应该遵循一条原则:即归化时尽量不失去原文的味道,异化时也尽量不妨碍译文的通顺易懂。如果译者在面对各种文本时都单一地采用一种策略,这将违背翻译的目的,降低译文质量,误导甚至失去读者,也不能很好地进行文化交流与传播。基于此,笔者结合中国的传统哲学思想,尝试着提出了“中和优化”的翻译策略。

(二)“中和优化”翻译策略的内涵

在翻译实践中,所有译者力求达到的目标都是译文既要再现源语语言特点和文化信息,又要符合目的语规范,自然流畅。但是如果单纯依赖归化或异化的翻译策略是很难达到这样的目标的,正如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在旷日持久的归化与异化的争论中,随着翻译实践经验的丰富和社会语言学等相关学科的发展,翻译理论界终于意识到归化与异化翻译并非始终对立和排斥,而是相互关联、相互补充、相互融合的,两者各有其长处与不足,又都有自己存在和应用的價值。

在单一的归化异化都无法完全实现翻译目标的前提下,笔者参照翻译文化派的思想,通过大量的中国古典文学文本的翻译实践,提出了既考虑源语的语言与文化,也考虑目的语的语言和文化,在翻译中采取“中和优化”的翻译策略。

中国著名的四书五经之一《中庸》曰:“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和”即为和谐、协调,不偏不倚符合原则。将之作为一种翻译策略,则可理解为在翻译时,不能局限于采用单一的直译或意译,归化或异化,而应考虑源语和译语的语言和文化特征、原作者的写作意图、情感内涵和目标受众的理解力及接受程度等因素,选择恰当的翻译策略或策略组合对译语进行异化。好的翻译是在保持译文适度异化的基础之上,通过译者的艺术再创

造加以优化,使源语与目的语、作者与读者相互和谐顺应。译文优化过程就是突破源语语言形式的束缚,在形与神、信与美的对立中寻求和谐优化的过程。

比如,对汉语中耳熟能详的俗语“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杨宪益先生将之直译为“Three cobblers with their wits combined equal Zhu Geliang”^[10]。诸葛亮这个在中国家喻户晓的历史人物,但按照此译文,对于不了解中国历史的西方读者而言,势必会感到丈二和尚摸不着头,无法明确对诸葛亮的身份认同,这必然会阻碍信息的交流和沟通。但倘若在翻译中既考虑到保留中国的传统历史文化,又兼顾到西方读者的理解及接受能力,把该俗语翻译成“Three cobblers with their wits combined equal Zhu Geliang - the master of mind in China.”就能够既使读者理解和欣赏源语所承载的文化信息,又有效地将源语语言和文化移植到目的语语言和文化中,丰富目的语文化,促进跨文化的交流。

“中和优化”的翻译策略主张在考虑源文本的时代背景,文化内涵,语言特点,写作手法和艺术表现力等因素下,充分理解源文所传递的语言和文化信息,并不单一而固执地使用某一种翻译方法,而是从源语和目的语的实际需求出发,综合运用多种翻译策略,从而达到既保留源文信息和风格,又“优化”译作,保持翻译适度异化的目的。

六、“中和优化”在中国古典文学翻译中的应用

(一)中国古典文学翻译的难点

中国古典文学是中国古代丰富文化积淀的产物,反映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涉及的共时和历时文化颇丰,包括民俗文化、语言文字文化、文学艺术文化、宗教文化、地理文化、建筑文化、园林文化等。在全球化日益发展的今天,我们有义务将我国优秀的古典文学作品通过翻译传递给世界,共享辉煌的人类文化遗产。

两种语言间的翻译已非易事,更何况古典文学翻译。语言文字、艺术手法、文化内涵是横亘在中国古典文学翻译中突出的三大障碍。就语言材料而言,大多古典文学使用的都是古代汉语,即便是浅近的古汉语,也与现代汉语的语言文字有很大的差异。对译者而言,正确理解古汉语就成为译前准备工作中至关重要的环节。

写作时纷繁复杂的艺术手法是翻译中的另一大障碍。以四大名著之一的《红楼梦》为例,曹雪芹采用了对称结构,即前文伏笔、后文交代。人物姓名、语言、诗词等都和情节紧密相关。其笔下人物的姓名、言谈举止的方式、诗词歌赋甚至饮食的偏好等都与人物的命运息息相关,是我国古典小说中艺术手法最为复杂的文学作品,为翻译带来极大困难,几乎成为不可逾越的障碍。

较之以上两个方面,最难于在翻译中体现的是中国古典文学中极其深厚的文化内涵。笔者仍然以《红楼梦》一书为例。该书涉及了中国清朝及其以前的历史文化,既包括清朝本身存在的满族文化和中原文化的相互交融,还体现了大量的诸如儒家文化、道教文化、佛教文化等大量的中国传统文化,在这些文化背后又折射出中国悠远的哲学思想。在理解该书时需要将

书中的文字描写与其暗含的文化结合起来,译出字里行间以外的含义。因此,在进行古典文学翻译时,译者必然会不可避免面对上述的几大障碍。如何很好地弱化甚至排除这些障碍取决于译者采用的翻译策略和方法。下面,笔者将从词汇,句子和篇章等三个方面分别举例来探讨“中和优化”翻译策略在中国古典文学翻译中的应用。

(二)“中和优化”在中国古典文学翻译中的应用

中国古典文学从语言方面来看,具有开放性、多义性、模糊性、含糊性和不确定性的特征^[19],结构独特,风格复杂。翻译是尽量在对等的基础上对原文进行再创造,而所谓“对等”,主要涉及到词汇、句子结构、整体篇章和表达方式等层面。

1. 词汇层面

在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富含极具中国文化内蕴的文化负载词汇,有些词汇与目的语具有相对应的物质概念或基本意义,但不少表达却是中国文化的独特体现。因此在对此进行翻译时最好避免采用可能使西方读者误解和难以接受的直译的方式,而采用意译的方式,既能传递其文化语用意义,又可避免产生文化冲突。

例如《红楼梦》第九回中有“这学中……‘一龙九种,种种各别’,未免人多了就有龙蛇混杂”一语^[20]。杨宪益、戴乃迭将之译为:“……as the proverb so aptly says, ‘A dragon begets nine offspring, each one different.’ And inevitably among so many boys there were low types too, snakes mixed up with dragons^[21]。”那么中西方在认知语境中对“龙”所代表的文化内涵是否是相似的呢?

“龙”作为华夏民族图腾的象征意象之一,带有典型的中国传统文化色彩,具有“至上至尊”的语用褒义。在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有许多与“龙”有关的表达法,如望子成龙,龙凤呈祥,龙的传人等。但在西方国家,“龙”却含有“凶残、邪恶”的语用意义。例句中的“龙”是贾家尊贵门第和才德之人的标志,将其直译为“dragon”却使西方读者误认为贾家人多势众,恃强凌弱。同时,在西方文化中,龙蛇并无天渊之别之意,所以直译为“snake”和“dragon”难以传递出原文拟展示的信息意图和象征意义。笔者本着“中和优化”的翻译策略,尝试着将此句译为“……as the proverb so aptly says, ‘A noble man begets nine offspring, each one different.’ And inevitably among so many boys there were low types too, mixed up with achievers.”在此译文中,笔者将由于中西文化差异而易引起误解的“龙”、“蛇”意译,明确其指代意义,既表达出了源语的意图,又使目的语读者一目了然。

再以《红楼梦》中“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为例。Hawkes 将其翻译为“Man proposes, God disposes”,虽然与英语中的概念意义相似,但显然该译文忽略了原小说中人物刘姥姥所具有的佛教徒色彩,而想当然地赋予其基督教色彩,让读者误以为基督教亦是中国的主流宗教,阻碍了西方对中国文化和宗教的了解。而翻译家杨宪益先生在翻译此句时对译文进行了艺术的再创造,将其译为“Man proposes, Heaven disposes.^[21]”。该译文既借用英语习语的语言结构,利于目的语读者理解,又忠于原文,体现源语的文化特点,使得源语与目的语有机结合、作者与读者和谐顺应,从而达到了译文“中和优化”的翻译效果。

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是以诗体形式书写的叙事散文,描绘了一个自给自足,与世无争的理想社会。在这篇共计 254 个字的散文中,一个出现了三次“外人”一词:

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

自云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间隔。

此中人语云:“不足为外人道也。”

美国著名的汉学家,哈佛大学教授海陶玮(James Robert Hightower)将这三个“外人”分别翻译为:“ordinary people”,“out-side world”,“outsiders”。后面两个“外人”是桃花源中人对外面世界的认知,所以这两个译法是准确的。第一个“外人”是从武陵渔人的角度对桃花源里人们的看法。他们自秦朝开始与世隔绝 500 余年,其衣着不可能与五百年后的晋人服饰相同,因此渔人对他们的衣着感到奇怪,认为是异域人或异族人^[20]。海陶玮将之译为“ordinary people”,并未完全理解原文的意思,因为在渔人的眼中,桃花源里的人们显然不是和他一样的普通人。根据其语义和语境,本着“中和优化”的翻译策略,笔者将之译为“exotic people”,能较准确地表达出该语境中桃花源中人的奇异之感。

2. 句子层面

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形式多样,诗、词、歌、赋、散文不一而足。每种形式在意境和写作手法上都有其独具的特点,因此在翻译时不能仅局限于意思的传递,还要关注其艺术形式,尽量还原其特有的艺术手法。

李白《长干行》的前三句中:“妾发初履额,折花门前剧。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同居长干里,两小无嫌猜。”对其中的第二句,庞德将其译为:

You came by on bamboo stilts, playing horse,

You walked about my seat, playing with blue plums^[21].

诗中的“骑竹马”是指小孩儿将竹竿放在胯下当马骑;床指井口的围栏。由此诗演化而来的两个成语“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常用来描摹幼年男女间天真无邪的纯真情谊,极富深厚的文化蕴意。然而庞德对中国文化了解甚少,将“竹马”误译成了“竹跷”,将“床”误译为“凳子”。同时“骑竹马来”并非简单随意的“来”(came by),根据小男孩儿的性格特点,应该是“跑来”(ran to me)。庞德的译文和原诗拟表达的意思有一定的出入,也隐形流失掉诗中所表现的文化意向。

笔者运用“中和优化”的翻译策略,兼顾到诗的原意和意境及受众对中国文化缺失等因素,将这两句诗译为:

You ran to me with a bamboo stick under your crotch as a toy horse,

You walked around the well mouth with blue plums playing in your hand.

在此译文中,笔者明确将“竹马”作为一种玩具翻译出来,让受众了解其是中国小孩儿的一种玩耍工具。如果只是简单地译成“bamboo stilts”和“playing horse”,目的语读者会完全不知所云,后面的一句也是同样的道理。根据诗歌的句法特点,笔者运用相同的英语语法结构

(*under your crotch* 和 *with blue plums*), 既从语言层面较好地体现了原文的特点, 又将此诗中表现的少儿男女间的天真和单纯传达了出来。

李白的另一首诗《宣城谢朓楼饯别校叔云》创作于安史之乱前不久。诗人满怀政治抱负来到长安, 任职于翰林院, 两年后却因谣言被迫离开朝廷。几年后李白客居宣州不久, 其故友李云至此, 李白陪他同登谢朓楼。这是一首饯别抒情诗, 但并不直言离别, 而是重笔抒发诗人怀才不遇的激烈愤懑和对光明世界的执著追求, 既满怀豪情逸兴, 又难掩郁闷不甘。诗中蕴含的思想情感极其强烈, 回复跌宕, 如奔腾的江河波澜迭起, 虽烦忧苦闷, 却并不阴郁低沉。对其中千百年来描摹愁绪的名句“抽刀断水水更流, 举杯消愁愁更愁”, 庞德将其译为:

Drawing sword, cut into water, water again flows.

Raise cup, quench sorrow, sorrow again sorrow^[24].

中国的近体诗(唐代及以后的诗, 唐代以前的诗为古体诗)为了声韵和谐, 一般押平声韵。对绝句和律诗而言, 还讲究对仗工整, 即上下两句的平仄相反, 句型相同或相似, 句法结构一致。如主谓结构对主谓结构, 偏正结构对偏正结构, 述补结构对述补结构等。即使句式结构不同, 但要求字面相对, 且词语的词性一致。从对仗和押韵的角度出发, 这两句诗采用的是平平仄仄仄仄平, 仄平平平平仄平的押韵方式, 对仗极其工整, 句法结构一致。就该句译文的整体而言, 庞德大致译出了其主体意思和蕴含的部分文化意境, 但却无法让目的语受众充分了解中国诗歌在语言结构上表现出来的美感。就中国古诗具有的对仗工整和句末押韵的特点而言, 不论是在两句的语法结构还是词汇的词性等方面, 庞德都未能在此两句英语译文中很好地体现, 几乎完全失去了该诗作为诗歌的特色, 也就难以向受众充分传递我国古诗的韵味。在充分理解原诗意境的基础之上, 本着传递中国文化的目的, 同时考虑到受众的理解水平, 笔者将传统意义上的归化异化等翻译策略进行“中和优化”, 尽量保持原诗的对仗和押韵等特点, 尝试着将这两句名诗译为:

Cutting sword into water, water rolls and rolls.

Drinking wine from sorrow, sorrow builds and builds.

在笔者的译文中, 分词结构 *cutting sword* 对应 *drinking wine*, 介词 *into* 对应 *from*, *water rolls and rolls* 对应 *sorrow builds and builds*, 句型工整整齐, 语法结构一致, 每句的最后部分用重复的手法强调出诗人的“水更流”和“愁更愁”的忧郁和悲愤。就此句而言, 个人认为笔者的译文在传神达意和保留诗歌体裁方面比庞德的略胜一筹。

3. 篇章层面

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的语篇形式特点鲜明, 将丰富的中国文化融入频繁运用的意象、典故、双关之中。“汉语言文字之艰深, 古典诗词蕴含只之深广……严格的格律, 高深的典故, 巧妙的双关, 独特的诗风等”^[25]是横亘在译者面前的一座大山。在翻译时如果忽略了这些因素, 读者便很难进入原作中的意境。以唐朝著名诗人杜牧的七绝诗作《清明》为例:

清明时节雨纷纷,

路上行人欲断魂，
借问酒家何处有，
牧童遥指杏花村。

著名翻译家黄新渠教授将全诗译为：

As the Qingming Festival comes around,
Thick and fast, the rain is falling down.
On the way to the graveyard to pay homage.
I visit my deceased with a broken heart.
Where may I find a wineshop to kill my sorrow?
A cowboy the way to Apricot Flowers Village shows^[26].

该诗着重刻画了清明时节在绵绵春雨中祭祀的行人神态，场景色彩清淡，突出祭祀者的凄乱心境及诗人摆脱凄冷的迫切心境。从黄新渠的译文来看，译者主要以读者的语言为主体，严格遵循英语的句法特点，采用了归化的策略和直译的方法，以叙事的方式呈现给受众。然而笔者认为，此译文虽然完整再现了诗人当时祭祀先人的情景，但却忽略了整首诗的篇章特点，未能译出该诗凄苦的意境和韵律，同时还有信息缺失的现象（第二句“路上行人欲断魂”的“行人”是指去祭祀先人的路人，但黄新渠的译文完全忽略了“行人”，仿佛去祭祀的路上只有作者一人）。下面再看看著名翻译家杨宪益先生和戴乃迭先生的译本：

It drizzles endless during the rainy season in spring,
Travelers along the road look gloomy and miserable.
When I ask a shepherd boy where I can find a tavern,
He points at a distant hamlet nestling amidst apricot blossoms^[27].

在这个译文中，首先，译者在第一句中并未明确译出此诗描写的时节，而一个概括性的“the rainy season in spring”并不能完全等同于清明这一特殊时段。第二句中的“行人”并非普通的“travelers”，而应该特指去扫墓的人们，因此译成“travelers”使诗中的特指变成了泛指。在第三和第四句中译者用增译的手法将人物转移到了“I”身上，“我问牧童哪里可以找到小酒馆”，让人觉得很突兀，也未能让读者感受到诗作者在清明时节的悲伤和拟借酒浇愁的心情。因此整首诗的译文在意思、意境和韵律等方面都表现得差强人意。

笔者在既保留原文意境和韵味又易于受众接受的原则下，中和优化了归化和异化等翻译策略，尝试着将此诗改译为：

A drizzling rain falls endless on the Mourning Day;
The mourners' go along in dismay.
Where is a tavern to bury the sad hours?
A cowboy points afar to apricot flowers.

此译文开篇直奔主题，明确指出场景发生的时间是“Mourning Day”，路上“欲断魂”的行人

显然是心怀悲伤去祭祀先人的“mourners”,同时这两句的最后两个单词“Day”和“dismay”押韵。中国人素有借酒浇愁的习惯,因此第三句“借问酒家何处有”的发问者并不一定是诗人,也可能是“行人”,所以英译时不必译出是“谁”“借问”。此句译文的“to bury the sad hours”是为了契合原诗的意境,直抒在清明时节人们的胸臆,笔者补译出喝酒的目的是为了消愁。同样,第三句和第四句的“hours”和“flowers”也实现了诗歌的对仗和押韵。

再以唐代诗人王维的七言绝句《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为例,原诗如下:

独在异乡为异客,
每逢佳节倍思亲。
遥知兄弟登高处,
遍插茱萸少一人。

这首诗是王维 17 岁时因重阳节思念家乡的亲人而作的一首著名的思乡诗,抒发了身在异乡的游子恰逢佳节对故乡亲人的思念之情。开篇一个“独”字就将诗人客居异乡的孤独寂寥表现得淋漓尽致,第二句则用朴实无华的语言直截了当地写出了远离家乡的游子对亲人最直白深沉的思念。后面两句诗人从亲人的角度出发,想象大家相聚时发现独缺自己,从而感受家人对作者的思念。

陈君朴先生将全诗译为:

Thinking of My Brothers in Shandong on the Double Ninth Festival
A stranger in a strange land on each holiday,
I think of my kinsmen with a double care.
I know when my brothers wear medicine bags,
At the heights, they would find one to spare^[28].

唐一鹤将该诗译为:

Reminiscent of My Brothers in Puzhou to the east of Huashan on the Double Ninth Festival
Being a stranger alone in a strange land,
I miss my dear ones on every happy festival with a heavy mind.
I know from afar the heights where my brothers have ascended,
With dogwoods on their heads but without me accompanied^[29].

在翻译此诗之前,首先应该了解诗名中的“山东”是否就是指现在的山东。王维家居蒲州(今山西永济),位于华山之东,而非现在山东省所在地,因此陈君朴译文中(以下简称“陈译”)的诗名翻译就纯属误译了。唐一鹤译文(以下简称“唐译”)对“山东”的位置倒是把握较准确,但为明确地理位置而采用如此长的介词结构作为诗名翻译出来便有待商榷了。原句中的“每逢佳节倍思亲”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翻倍”或“两倍”思念,而是指相较平时而言,在节日时“特别”或“尤其”思念亲人,陈译的“double care”显得太过生硬,仿佛思念不多不少,刚好两倍,唐译用了一个模糊概念“heavy mind”,在意思上反而更接近原文。“遥知兄弟登高处”中的“遥”是

一个重要信息,再次强调作者客居异乡,远离亲人。但陈译对此却完全忽略,导致重要信息的缺失。唐译对此的处理要好得多,译出了“from afar”的距离感。“插茱萸”是古人在重阳节的重要习俗,寓意消灾避难,会把茱萸直接插在发髻上,或者将茱萸的茎、叶或果实装在布囊里系在手臂上。陈译将之译为“medicine bags”不免让人啼笑皆非。

整体而言,陈君朴更多使用了直译的方法,但却牺牲了全诗浓浓的思乡情愁。唐一鹤将直译和意译、归化和异化结合使用,对原诗意境的把握就要好得多,但其诗名的翻译却是一大败笔。

笔者根据原诗表达的意境及其所包涵的重阳节文化,运用“中和优化”的翻译策略,尽量保持原诗的表现手法,注重韵律,不使用标准的英语语法结构,尝试着将此诗译为:

Thinking of My Brothers on Double Ninth Day
A lonely stranger straying around,
Sore homesick on every festival in mind.
Knowing afar brothers on a mount-top cheering,
Wearing dogwood on heads without my accompanying.

在此译文中,笔者仍然注重诗歌的韵律和对仗,一二句用“around”和“mind”押韵,第三四句则用两个分词“cheering”和“accompanying”保持对仗工整,既译出了诗人的思乡情节和亲人对诗人客居他乡的遗憾,又保留了中国诗歌的写作手法。既不完全直译,也不单一意译,尽量在原作者和目标受众之间寻求一个结合点,从而实现作者和读者的对话。

七、结 语

古典文学的不可译性是语言中的客观存在,只有很好地掌握了某语言才能领悟和欣赏该语言的表达方式和传递的文化信息。在 21 世纪的今天,全球化是时代的大趋势,与之相适应的是各民族文化高度开放,相互渗透。翻译作为跨文化交流的桥梁,科学恰当的翻译策略能够进一步地促进各民族文化的传播、交流与融合,将可译的成分大大增加。一个好的译者不仅需要精通源语和目的语,熟练掌握两种语言的语言形式和技能,还需要熟悉两种语言所承载的不同文化内涵,做到中西贯通,这样才能在实际翻译活动中避免严复所谓的“译犹未译”,译文生硬晦涩现象,避免文化误导甚至冲突,做到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传真,源语与目的语、作者与读者的相互和谐顺应。

传统的归化与异化翻译各有利弊,归化翻译在一定程度上抹灭了源语的文化特征,不利于传播异域文化;异化翻译又忽视了目的语读者的接受力和理解力,违反目的语语法和文化规约。笔者认为,归化还是异化翻译并非对立和一成不变,彼此的取舍始终是个变量,存在着一个“度”的把握问题。在翻译活动中译者应从跨文化交流的角度出发,针对不同语言和文化的异同,不同的文本类型,不同的翻译目的、作者意图和目的语读者对源语及其文化的了解程度及理解水平,采用“中和优化”的翻译策略,使源语和目的语相得益彰,不仅使译文更准确、顺

畅、生动,又能让读者理解原文的语用意义并领略到原文所蕴含的文化涵义,避免翻译过程中文化特色的缺失,达到促进跨文化交流的目的。

参考文献:

- [1] 王晶茹,刘丽娜.商务沟通中口译人员的跨文化意识培养[J].学周刊,2017(1):217-219.
- [2] 辞海语词分册(下)[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1.
- [3] 王克非.关于翻译本质的认识[J].外语与外语教学,1997(4):47-50.
- [4] 肖志清,谢少华.季美林的翻译观探究[J].重庆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3):102-107.
- [5] 宋连香.文化缺省与翻译补偿[J].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2):351-353.
- [6] Venuti,L.Rethinking Translation[M].London & New York:Routledge,1992.
- [7] Nord,C.Text Analysis in Translation[M].Amsterdam Atlanta,GA,1991.
- [8] 傅雷.傅雷文集(文艺卷)[M].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6.
- [9] 郭建中.汉英/英汉翻译:理念与方法(下)[J].上海翻译,2006(1):18-24.
- [10] 许渊冲.文学翻译与中国文化梦[J].中国外语,2014(9):11-18.
- [11] 江华,戴炜华.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翻译的美学思考[J].上海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10-14.
- [12] 茅盾.为发展文学翻译事业和提高翻译质量而奋斗[G]//翻译研究论文集(1949—1983).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4.
- [13] 罗新璋.“似”与“等”[J].世界文学,1990(2):285-295.
- [14] 葛晓晶.浅谈翻译学文化转向的衍化[J].外国语文,2012(7):102-104.
- [15] Bassnett,S.Constructing Culture:Essay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M].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2.
- [16] 张灿灿,张立丽.翻译学中的文化转向研究[J].湖南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4):107-108.
- [17] 顾建敏.互文视域下的文化意象翻译[J].河南社会科学,2011(6):203-204.
- [18] 彭仁忠.论异化翻译策略与跨文化传播[J].外语学刊,2008(4):122-124.
- [19] 郭建中.创造性翻译与创造性对等[J].中国翻译,2014(4):10-15.
- [20] 曹雪芹,高鹗.红楼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 [21] 杨宪益.A Dream of Red Mansions[M].Foreign Language Press,2001.
- [22] 马歌东.《桃花源记》“外人”误读辨正[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4):76-81.
- [23] 李莉.目的论视阈下庞德翻译观探讨——以《长干行》英译本为例[J].鸡西大学学报,2011(6):82-84.
- [24] 段丽.有机杂合,和谐共生——全球化背景下古诗英译的生态翻译取向[J].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125-128.
- [25] 李长忠.中国古典诗词及其英译语篇特征对比[J].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04(6):53-56.
- [26] 黄新渠.译海浪花——黄新渠译文译诗选集[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4.
- [27] 吴单丹.从解构《清明》看译者对意图的理解及影响因素[J].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2):113-115.
- [28] 陈君朴.汉英对照唐诗绝句 150 首[M].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5.
- [29] 唐一鹤.英译唐诗 300 首[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

责任编辑:陈于后

A Translation Strategy of “Balanced Optimization” in Chinese Classical Literature

Zou Can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Chengd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Chengdu 610059, China)

Abstract: The increasing globalization fuels the wide communication and cooperation in the fields of politics, economy, military and cultures in the 21st century. The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universally accelerates the overseas publicity of Chinese classical literature and the cry for translation is accordingly demanding. In the process of C-E translation of these great works containing rich history and culture, the author finds that it is extremely hard to achieve the goal of both retaining the source culture and matching the target expression simply by means of either literal or free translation, domestication or foreignization. Hence, the author proposes the translation strategy of balanced optimization creatively. That is, from the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 considering the linguistic and cultural differences of both source and target texts, the writing purpose and emotional connotation of the original author, diverse audiences and readers’ understanding of source language as well as its culture, translators should try to employ appropriate strategies or strategy profile to foreignize the translation and hunt for a balance between the two texts as well. The art recreation of the translator can optimize and break through the confine of the source text linguistically to seek harmonious optimization between the form and the connotation, faithfulness and elegance of the target text. The strategy of balanced optimization is expected to bridge the gap between the original author and the target readers to help them comprehend the linguistic beauty and cultural connotation as well as spreading Chinese classical literature globally.

Key words: cross -cultural perspective; Chinese classical literature; balanced optimization; translation strategy; domestication; foreignization